



怀素《自叙帖》局部。资料图片



黄庭坚《松风阁诗帖》局部。资料图片

◎教师文苑

一本词典，一段时光

王俊苏

“妈妈，这几个本子要扔吗？”女儿问。
“你翻翻，用了就扔掉，没用就留着。”我一边把书架上的书往整理箱里搬，一边头也不回地回答她。

“用过的。不过——”女儿的声音突然停了。片刻后，她清脆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你一定舍不得扔哦——要不你瞅一眼？”

很快，我手心里出现了一摞厚本。确乎是旧日的本——都是四开教科书般厚薄大小，最上面的一本封面弄脏了，只剩下发黄发黑的白色硬纸皮，且遍布着不规则的各色笔道子，有的页脚已翘起了毛边……

怎么越看越眼熟？难道是——我猛地抬起头看向女儿，她也正笑吟吟地看着我，两人异口同声地喊出：“背词典！”

这三个字冲出喉咙的瞬间，一段记忆也冲破了闸门，如潮水般奔涌而至……

2019年，6年前。

那年我36岁，评职称带来的喜悦早已褪去，彼时的我，正陷于不知“路在何方”的人生茫然期。

那年她10岁，刚上四年级。面对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学习内容，彼时的她，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与否定。

在这之前，我曾陪她共读过很多书。从稚嫩的“人之初”到清脆的“人生代代无穷已”，从小鸡卡梅拉到后来的爱丽丝、小土豆、林英子……太阳依旧东升西落，然而饭桌上、书桌前，那些只有我们一家人的时空里，我与她的争执越来越多。当又一次用故事里的人物来激励她时，她激动地反驳道：“我不是他们！我就是个普通的孩子！”

何去何从？这不仅是我作为教师的职业困惑，更是我身为母亲要突破的人生迷局。

9月底的一次培训成了契机。听完孙万里教授溯源源教语文的精彩课后，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带着女儿一起背词典！字词是语文的基础，背词典对身为初中语文教师的我肯定大有裨益，四年级的女儿也必定能打下扎实的学习根基。

这本《现代汉语词典》共1760页，如果每天背3页，除去周末和假期，大约需要2年半。于是，我兴高采烈地与女儿分享了一个“3计划”：启动口令3个字——“背词典”，内容每天3页，期限为3年。

“3计划”第一天，便遇上了难题。我们商定的方法是先写笔记后听写，但女儿写笔记竟耗时半个多小时，差不多把所有词语都抄了一遍。我忍不住笑了，拿出自己的笔记让她进行比较：你为什么要用红笔写“阿嚏”的“嚏”字？你怎么少写了“阿公”“阿婆”？

我耐心地解释，并告诉她，笔记不是都要记下来的，要根据自己的知识和阅历有选择地记，适合自己学习习惯的才是最好的笔记。那天，我们约定彼此的笔记不得超过半页。

也是在第一天的学习里，我们发现，原来词典并不是冰凉的工具，里面呈现的世界是无比广博的：有化学里的“阿伏伽德罗常量”，有医学里的“阿尔茨海默病”，有鲁迅笔下的“阿Q”，有生活里的“阿猫阿狗”……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背词典”的旅程。每晚8点半成了我们最期待的时刻，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在8点半之前结束家务或作业，一起坐到书桌前，拿出笔记本，翻开词典——

这本厚厚的词典，为我们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原来词典上不仅有字，也有很多插画。例如“车”字的词条，词典把“上古的车”和“车轮（旧式的）”直接画了上去，引得女儿也经常在笔记本上勾勾画画。

原来多音字是有规律可循的，多是为了区分词性和词义。如“将”，读jiāng时，动词可作“带”“领”之义，副词可作“将要”之义；读jiàng时，作“将官”“将领”之义；读qiāng时，又作“愿”“请”之义。

原来形容人孤独，可以有很多词语：孤苦伶仃、孑然一身、茕茕孑立、形单影只、形影相吊……

原来很多我们常用的方言，古人也用过：她常听我说的“茱萸”“调羹”，念出来比“香菜”“小勺”更觉亲切……

背完词典的那天，我们并没有大事已毕的激动。用得最破的一摞笔记本，被我们放进了书架的最上层。我们长舒了一口气。

——你又什么气？
——你又什么气？
——你前面背过的怎么已经忘了一多半呢？
——好巧，我也是！

说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好像都成熟了许多。她已成长为七年级的初中生，拥有了越来越强的学习能力；而我在机缘巧合之下通过了市级教研员的遴选，迎来了职业生涯的新阶段。

“所以，要扔吗？”女儿又在旁边催促。“都行吧。不对，你的怎么少了一本？”我问她。

“你的也少了一本！”她叫道。
“唉——”
“你又什么气？”
“好像我背过的——全忘光了！”

“不止吧，你好像把我们‘背词典’这件事都忘光了！”女儿顿了一下，“巧的是，我也是——”
看着眼前这个笑靥如花的少女，这么一个高我半头、已上高一的少女，我突然眼里酸酸的。扭头看去，大红的词典似乎正应和着窗外红灯笼舞动的节拍，轻轻吟唱着：不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惧将来。

（作者系河南省安阳市教育教研中心初中语文教研员）

◎大家谈美

程仲霖

“蛇”字由象形向抽象演进，书法艺术以汉字符号表现美

蛇是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一，在地支中排第六位，称为巳蛇。蛇作为爬行动物，在人类穴居的远古时期非常常见。在汉字的古文字系统中，“蛇”字是象形字，在三千多年前就出现了。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字形呈现出蛇的大致形状，尤其突出了蛇的头部较大和身体弯曲的特点，非常形象，并且蛇身的斑纹比较多，现在已基本公认为是“蛇（它）”字（图1）。从文字演变的角度看，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数量还是结构都证明它是较为严密而且系统的文字，但一字多形的情况，也说明当时字形还不够稳定。

不过，在甲骨文之后，“蛇”字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写作“它”。西周中期师遽方彝的“它”字保留了蛇身的基本特征，但蛇身的斑纹则仅用一条竖线来表示，这是一种明显的简化；西周晚期伯康簋的“它”字上部线条与躯体分离，象形性进一步减弱。到战国时期，“它”字出现了不同的写法。从出土文献资料看，战国时期的上博简已经在“它”字基础上增加“虫”字旁（左“它”右“虫”），出现了今天我们所见的“蛇”字，这在秦时期的出土资料中就更为常见了。也就是在同一时期，《睡虎地秦墓竹简》中首次出现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搭配的生肖文化，“日书甲种”“盗者篇”记载了十二地支占盗法，说的是某地支日会有某种相里等。其中“巳”日记载：“巳，虫也。盗者长而黑，蛇目，黄色，蛇在足，藏于瓦器下。”这里说的“虫”就是蛇，与“巳”相搭配正是蛇这一动物。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它”字的篆形解释为：“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凡它之属皆从它。蛇，它或从虫。”上古时代，草莽丛生，虫蛇出没，先民草居野处，经常受到蛇的侵扰，因此见面时便关切地问：“没有遇到它（蛇）吧？”章太炎在《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中就说过：“一切动物皆着虫旁者，以古无房屋，草居野处，所患者虫，故无它即无蛇也，于是以蛇表一切动物。”许慎说的“它或从虫”这个“虫”字，读huī，后来写作“虺”，《说文解字》中说：“虺，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根据解释我们可以知道“虫”为蛇之一种，体宽三寸，头较大，并非今天的简体字“虫”（繁体为“蟲”），在《说文解字》中是独立的一个字。《说文解字》中“它”和“虫”的篆形是在战国文字基础上的进一步规范，但表示蛇头与蛇躯体的线条依然是相接的。从许慎的解释看，二者所指本为同一种动物，所谓“象冤曲垂尾形”“象其卧形”的不同，应是其篆形之别，而非指不同的动物。

战国时期汉字开始发生隶变，汉字的线条由曲逐渐变直，到了睡虎地秦简的“它”字形体线条便明显拉直了。到了汉代，如马王堆帛书和居延汉简的“它”

篆隶楷草显——「蛇」字演变与以蛇喻书



蛇定韵

	蛇	它
高代甲骨文		
周代金文		
战国至秦代文字		
秦汉小篆		
早期隶书		
晚期隶书		
楷书		

图1 “蛇”字的演变。本文作者供图

字，弯曲线条已经完全拉直。东汉熹平石经的“它”字不仅线条拉直，而且线条变为笔画。其后，到魏晋至隋唐，汉字进一步演变为由横、竖、撇、捺、点、折等笔画组成的楷书，并作为主流字体稳定下来，沿用至今。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社会交往中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蛇字的演变过程，也印证了汉字从具象形到抽象表意的符号化过程。先民选择抽象的点、线作为基本的构形要素，形成一个个符号化的汉字结构，是一件十分玄妙的事情。书法艺术以汉字为基础，但要对这些汉字的结构造型进行处理，体现出巧妙的艺术性，变成各种艺术形象，产生美的感染力。正如宗白华所说：“这字已不仅是一个表达概念的符号，而是一个表现生命的单位，书家用字的结构来表达物象的结构和生气勃勃的动作了。”

蛇形多变，书法艺术也要求变化丰富

蛇的身体结构造成其形态的多变，既可以伸展成线，也可以蜷曲成团，甚至能迅速进行翻转、扭曲等复杂动作，这使它能够通过调整自己的位置或攻击猎物，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这种灵活多变性体现出一种智慧或神秘的力量，常常为人们的艺术创作带来灵感，尤其是书法家从蛇的形态中体会创作的丰富变化。

我们常说，书法艺术有点画用笔、结体取势、章法布局等基本要素，要想提高书法艺术水平，就要从这些方面表现出丰富的变化，呈现不同的意趣，反映出较为复杂的意境与情感。因此，有人形容书法如蛇一样，这是形容书法的线条、字势像蛇一样飞翔飘逸，充满活力，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可以说，变化就是书法艺术的生命。

汉字的形体各异，本来就有大小的区别，笔画也有长短的不同，一般人喜欢将小字写大，把大字写得紧凑，以求整齐划一；而书法家却根据艺术的需要，表现出无尽的形态，有时甚至会让大的更大，小的更小，长的更长，短的更短，但从总体上看来却又大小自然，长短和谐，宽窄得体，颇有生趣。比如，我们常常提起王羲之《兰亭集序》中的二十个“之”字，字字不同，如有助助，进而叹服王羲之高超的创造力。王羲之在他的《书论》中说过：“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其《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又说：“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中点画耳。”所以，我们看王羲之的书法，相同的笔画一定有正、斜、曲、直、粗、细等不同的变化，相同的部件一定有大、小、疏、密、轻、重的不同，真是千姿百态。唐代的李嗣真在《书后品》中评价说“羲之万字不同”。而且王羲之笔下的这些变化，表现得恰到好处，为后人所不及。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其“尽善尽美”，王羲之因此被称为“书圣”，这是对王羲之书法艺术无以复加的肯定。

以蛇喻书，表现书法的动态态势

古人论书法，常讲“势”。很多书论甚至直接以“势”命名，如蔡邕的《篆势》、崔瑗的《草书势》、卫恒的《字势》《隶势》等。这些书论常用比喻的手法解释书法中的审美意象，自然万物诸如山川、河流、虫蛇、鸟兽、云烟、草木等，都被用作比喻的物象。在众多的物象中，“蛇”作为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被经常使用。例如，东汉蔡邕在《篆势》中说“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纒”，这是用虫蛇蜿蜒盘曲的形象来比喻篆书的笔画形态。蔡邕在《九势》中又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这种“势”就是生命的表现，充满了生机勃勃的运动感。书法是以点线来传达和抒发情感变化的，蛇的形态特殊而多变，更容易让人联想到书法的线条。书法的线条像蛇游动一样，必须是活的，舒展流畅，充满生命的动感。

以蛇喻书，以草书为例更容易理解。萧衍《草书状》以“疾若惊蛇之失道”来形容草书创作过程中的疾速与随机应变。汉代崔瑗在《草书势》中说：“若杜伯捷毒，看隙缘蟻，腾蛇赴穴，头没尾垂。”我们可能无法准确知道“腾蛇赴穴”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但这种表现在特定形式之中的感性体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对应草书中，能想象到笔势是多么灵动。我们常把蛇称为“小龙”，书论中也常把蛇与龙联用比喻书法。如《草诀歌》开篇就说“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形容草书的屈曲盘旋，婀娜多姿，像龙蛇一样呈现出独有的生趣和活力。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说，“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描述了草书的笔势流畅、线条连贯、衔接自然，也证明了草书笔画所蕴含的力量与不可思议的变化。

以蛇喻书，也反映在书法风格上。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评价欧阳询书法“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浓淡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龙蛇战斗”，不但有动态之美，也充分说明欧阳询书法的险峻。唐太宗李世民则以“秋蛇”来形容书法的矫揉造作、盘曲僵硬，这虽然是贬义，但也由此可见蛇形在书法比喻中的普遍性。

这些书论中，蛇的意象从描述字体的飞动、书法笔势的迅猛与不可捉摸的书写节奏，到对书法家作品的风格比喻，都是对书势动态性的描述。它们反映了书法作品的张力和韵律，展现了书法艺术的深邃内涵，也体现出书法家所要传达的精神气质。（作者单位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视觉中国供图

苑利

“非遗进校园”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非遗进校园”，不仅锻炼了学生们的动手能力，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其价值不言而喻。但“非遗进校园”的短板也显而易见——即使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走进课堂，在两小时的有效时间里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

我们的答案是建设校园非遗博物馆，让非遗走进校园。校园非遗博物馆的展陈内容可以是单一主题，如校园泥塑博物馆、校园年画博物馆、校园剪纸博物馆、校园木雕博物馆等；也可以集各类非遗项目于一身，既包括剪纸、年画、布贴画、树皮画，也包括石雕、木雕、砖雕、玉雕，既包括陶瓷、琉璃、泥塑、面塑，也包括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以我们的经验看，校园非遗博物馆的展陈内容应该以青少年喜闻乐见、令人赏心悦目的工艺美术类遗产为主。

通过校园非遗博物馆的建设，我们力争达成三个目的：一是让学生了解祖先的审美，建立独具中国特色的审美体系。例如，从中国泥老虎

◎艺见

校园非遗博物馆建设：

让“非遗进校园”进入2.0时代

的雕塑中，孩子们可以感受到古代儿童在色彩的选择上更喜欢黄色、绿色以及品红色，在装饰装潢上更喜欢在小动物身上画牡丹等充满吉祥寓意的传统图案。这些工艺美术类遗产是艺人匠人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民间艺术，更能代表中华民族的审美观。要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底色，不了解这些来自民间的工艺美术类遗产是万万不行的，这也是民间艺术与只代表个人风格的文人创作的最大不同。

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差异，各地工艺美术所展现出来的审美取向也有所不同。例如，北方的年画用色饱满、线条粗犷，而南方的年画用色淡雅、线条细腻。这些规律性的特点需要我们通过精心的展览设计系统地呈现出来。

二是让学生了解祖先的智慧。例如，各

地的泥玩具都会弱化其突起部分，并以转型结构的形式将这些突起部分呈现出来，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儿童用手掰断的可能性。如在泥人、泥老虎的造型中，耳朵、脚、尾巴等突出部位基本上都是通过转型设计来解决容易折断的问题。

三是让学生了解祖先治理社会的方式。在祖先看来，工艺美术既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教化社会的方式，这与中国历史上一直秉持的“寓教于乐”思想和“文以载道”的学术传统息息相关。如年画中经常出现关公的形象，传统剪纸中经常出现岳飞的形象，玉雕中经常出现和合二仙的形象，显然与作者们希望通过这些形象的塑造，来强调诚信、善良、爱国、和善等民族精神与传统美德有关。

与“非遗进校园”传承模式相比，校园非遗博物馆建设有其独特的优势。



第274期